

## 传承之光

## 定县简的“重生”之路

贾连翔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这是《诗经》，定县简里竟然还有《诗经》！对一组竹简图像进行释读时，定县简整理研究团队兴奋不已。

近年来，简牍的出土发现呈“井喷”之势，促进了简牍整理和研究的快速发展，其成果积累丰硕，为中国早期文明和国家信史研究提供了大量可靠资料和关键佐证。

实际上，简牍出土时状况差别很大，除大家比较了解的以两湖地区为中心出土的饱水简牍和西北地区出土的自然干燥简牍之外，还有一些简牍境遇特殊，出土时性状极端恶劣，严重影响整理研究工作的开展。比如，1973年河北省定县八角廊西汉中山王刘修墓出土的一批竹简，学界称之为“定县简”，因墓葬早年被盗又被焚，竹简不仅被扰乱，而且已炭化。这种简被称为“火坑简”或“炭简”，表面呈黑色，与墨迹相混，在可见光下文字殊难辨识，加之竹简残损严重，出土至今已逾半个世纪，尚未能全部整理发表。

早在1966年6月，该墓考古发掘主持人刘来成先生就将定县简送至国家文物局，进行保护和整理。1976年6月，曾参加马王堆帛书整理的张政烺、李学勤、顾铁符、于豪亮等先生，受邀参与整理定县简。据李学勤先生生前介绍，当时是在台灯下通过调整竹简的侧视角度，发现炭化竹材的反光与其上的墨迹略有区别，可勉强辨识出文字。

这样艰难开展的整理工作，又因当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被迫中止。地震过程中，定县简得到了精心照管，但由于转移后封存的盛简木箱被不知情的维修工人倒置，致使竹简

又一次散乱，遭遇了二次损毁。

1979年，原整理者开始对竹简重新排序、编号，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张守中先生参与其中，并对一部分性状较好的竹简做了摹本，这已是当时记录这批竹简最有效的方式。次年4月，经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召集，定县汉墓竹简整理小组成立，整理出被奉为儒家经典的《论语》、曾一度被视为伪书的《文子》、《太公》（或称《六韬》）、六安王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正月参加朝会的全程记录等前所未见的珍稀文献共8种。其间参与整理工作的主要有刘来成、胡绍衡、刘世枢、何直刚等先生。

1995年8月，刘来成、韩立森等先生再次成立了整理小组，先后发布了《文子》、《六韬》、《论语》的释文。这一时期，定县简被转运回石家庄，入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定县简内容多为重要的古代典籍，具有重大学术价值，自出土后始终吸引着海内外学术界的关注。竹简在持续老化并分解，抢救性保护和整理工作日趋急迫。

2019年，由河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张文瑞、毛保中牵头，联合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和湖北省荆州文物保护中心，开展了新一轮定县简保护修复、图像信息采集和整理研究工作。

此次整理，开展了多学科联合攻关。荆州文物保护中心研究员方北松带领的简牍保护团队，根据炭化竹简物质形态特点做分类取样，对其进行显微观察、力学实验、结晶度计算和光谱分析等。同时，对平整的竹简和

发生形变的竹简分别开展试验，研发出了炭化竹简的加固复形技术。

定县简过往整理最大的困难在于无法采集到可辨识出文字的图像，清华大学的团队承担起这一任务。工作前期，笔者和刘少刚、郑子良、杨小亮3位研究员多次赴石家庄调研竹简现状，每次都顺路拜访当年制作定县简摹本的张守中先生，了解更多竹简的特性和当年整理的情况。根据炭化竹简墨迹的光谱特点，我们最终选定了多光谱信息采集的技术路线，经过半年多的试验，设计出一套专门针对定县简特点并可以批量进行图像信息采集的设备，成功攻克了定县简整理的关键难题。当采集出的图像照片呈现在90岁高龄的张守中先生面前时，他激动地说：“当年摹写时看不清的字现在都出来了！”

定县出土已50余年，整理工作经历了“三起三落”，每个阶段的整理者都为之倾注了大量心血，加之竹简现状与出土时变化很大，因此各阶段的整理成果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此次再整理，研究团队十分注重收集和整理原整理者所制作的摹本、释文卡片等一手资料，对相关学术史进行彻底梳理，这不仅可以全面反映定县简整理工作的历程，而且能继承和科学利用已有研究成果。

经过5年多的不懈努力，研究取得一系列突破性成果。2024年11月1日，《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成果发布暨学术座谈会召开，



▲张政烺、李学勤等书写的定县简释文卡片。

◀《定县八角廊汉墓竹简选粹》。

▶记载着《论语》的定县简在广域图像采集技术下显影并完成缀合。

以上图片均为贾连翔提供

并向全球直播。选粹中收录了定县简的广域图像、2.5倍放大图像及初次整理时的释文卡片，首次向学界揭开了定县简的“黑色面纱”。清华大学黄德宽教授等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广域图像采集技术使这批炭化竹简露出真容，收录的释文卡片使几代学人的辛劳不被埋没，这是本次整理工作的传承和创新，也是多学科联合攻关、有组织科研的成功典范。

目前，对变形炭化竹简的矫形，对广域图像的深度处理以及利用新图像进行的竹简释读、缀合复原等工作仍在进行中。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

“敌人在轰炸，我们在上课！”广西桂林市，刻在七星岩洞壁的这句标语穿越时光，至今读来仍令人震撼不已。

“洞中有山，山中有洞”，秀甲天下的桂林拥有岩溶洞穴3000多个，为战时的人们提供了天然庇护。东普陀山西侧山腰的七星岩洞如今是著名旅游景点，在过往桂林艺术节期间，这里也是热闹独特的“洞剧场”。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沦陷后，四面八方逃难的人沿着湘桂铁路奔向桂林。直到1944年桂林大疏散时，桂林人口已从抗战前的7万人飙升至50余万人。数年间，桂林文人荟萃，出版印刷业空前繁荣，文化团体、活动空前活跃，成为大后方文化中心之一，被誉为“文化城”。

“救、救、救中国，一齐向前走……”彼时的桂林，是敌人轰炸的重要目标之一。空袭前后，一群孩子高昂着脖子唱歌，围观的成人也情不自禁热泪盈眶，岩洞歌声震天，这是当时常见的场景。

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血腥侵略面前，孩子们快速成长。新安旅行团（以下简称“新旅”）、孩子剧团、厦门儿童剧团、广州儿童剧团等著名儿童团体，都先后来到了桂林。其中，由我党组织领导宣传抗日的新旅，是桂林儿童运动的佼佼者。除了深入剧院、教堂等地用快板、民谣等方式宣传进步思想，新旅的孩子们还根据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建议，利用老百姓在敌人空袭时进岩洞躲避的机会，开展“岩洞教育”。岩洞教育的内容丰富多样，讲抗战形势和抗战故事，教唱抗战歌曲，演活报剧和说快板，讲空袭常识，办岩洞图书馆，当“小先生”教识字，还有为老百姓代写书信的……新旅在桂林不到3年的时间里，组织团结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多个儿童团体。

如今的秀峰区解放西路，有一座红墙青瓦的洋楼——广西省立艺术馆。这里是桂林文化抗战的重要场所，被列入第八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4年，纪念西南剧展80周年暨第八届全国话剧优秀剧目展演举办，艺术馆就是重要的演出场地之一。许多从业者自发来到艺术馆献花，向欧阳予倩等先辈，也向波澜壮阔的历史致敬。

整个抗日战争时期，据不完全统计，桂林先后涌现各类书店、出版社近200家，各类文艺机构100多个，另有10多个剧院和电影院。这些文化团体和文艺团队经常开展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如报告会（讲座）、座谈会、展览会、音乐会、戏剧演出、街头宣传等，十分活跃。皖南事变之前，几乎每周都有时事或学术报告会，还有音乐会和文艺晚会，每月都有新的剧目上演，每季都可看到新的展出。这种盛况，在1944年春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时达到了高潮。

看戏是当时主流的娱乐方式。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桂系军阀为了搜刮民脂民膏，成立所谓“筹饷公司”，大开烟馆、赌场，用演戏来招徕烟棍赌徒，“赌戏”大行其道。“我们决不能让拥有大多数观众的旧戏，始终与抗战不发生关系。”受邀主持桂剧改革工作，欧阳予倩影响最大的3出戏《梁红玉》《木兰从军》《桃花扇》陆续问世。在欧阳予倩等无数艺术工作者的努力下，戏剧在烽火中不断淬炼，发挥了成风化人的作用，鼓舞民众奋起反抗。

1944年2月，早春的桂林阴冷潮湿，很多戏剧人从四面八方拉着板车、道具、服装，怀着朝圣的心情一路步行来到桂林，只为奔赴一个名为“西南剧展”的约。

2月15日下午3时，西南第一届戏剧展览会在艺术馆的新剧场隆重开幕。开幕式上，筹备委员田汉沉痛地掏出一份名单，悼念在抗战中牺牲的戏剧工作者，台下的戏剧人不禁流下热泪。“为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反对一切分裂行为和取消戏剧为抗战服务的行动。”这是大会《宣言》对戏剧工作的要求之一。

“壮绝神州戏剧兵，浩歌声里请长缨。”“鸡鸣直似鹃啼苦，只为东方未易明。”田汉在《庆祝西南剧展兼悼剧人殉国者》中这样写道。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西南8省的上千名戏剧工作者，在长达3个多月的时间里，总结了抗战以来戏剧运动的成绩和文艺抗战的经验，为迎接抗战胜利和新的斗争做了足准备。

今年桂林艺术节，七星岩洞再度迎来众多戏剧爱好者。文化抗战的遗迹，至今仍在滋养这座城市的文脉。

## 博古知今

重新审视淮河流域远古文化

中国的鼎，最早出现在淮河上游。河南舞阳贾湖遗址8000多年前的陶鼎，不仅开创了新风，此后还随着裴李岗文化的大扩张，在六七千年前的淮河中下游双墩、北辛文化中逐步流行，并风靡整个淮河流域，进而传遍华北、东南，形成覆盖半个东部中国的鼎文化圈。

距今8000多年的贾湖骨笛，音孔位置计算得十分准确，从早期的二孔、五孔、六孔到晚期的七孔、八孔，音阶也由四声、五声发展到七声，发展序列完整，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的管乐器。

淮河流域首创的其他多种文化因素，同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绿松石在8000多年前已作为饰品较多使用，从上游的贾湖、新郑裴李岗到下游的泗洪顺山集遗址一直传承延续，直到距今5000年前后的大汶口文化时期，淮河流域成为古时期绿松石使用的重要区域。二里头文化时期，绿松石成为早期王国重要的礼仪用品。

淮河流域的农业具有南北兼存的特点。稻作农业在8000多年前较早发展起来，上游的贾湖、下游的顺山集等遗址中都发现了较多稻谷遗存，泗洪顺山集遗址还发现了可能与稻作相关的迹象。旱作（粟黍）农业也几乎同时出现，郑州唐户遗址便属于黍、稻混作农业模式。淮河流域因地理位置成为中国最早广泛采用黍、稻混作的农业核心区，也是北方旱作农业向南传播的重要一环。贾湖人群还驯化出了中国目前最早的家猪，此后，家猪成为各地肉食的主要来源之一。

在距今5000年前后，来自淮水中游的红烧土连间排房深刻影响了淮河流域，并被快速吸纳。地面红烧土连间排房与北方长期流行的半地穴式单间成排房、南方独特的杆栏式连排房，成为史前最重要的三种排房形式。淮河流域不是地面连间排房发源地，但其在4000多年前的广泛使用和推广，深刻影响到夏商周三代大型建筑的格局。

用龟习俗也是最早起源于淮河流域，并长期在此流传。早在贾湖遗址中，人们就发现大量随葬真龟的现象，龟壳内还附有一些石子，到大汶口文化时期，这一习俗再次盛行，龟壳内常附有骨制的针、锥等，形成了相对稳定的龟占礼仪，影响了南北各地。到商周时期，龟占、骨卜共同成为古代先民观兆象占卜凶吉的重要方式，习俗传承数千载。

淮河流域的远古文化是中国东部地区独树一帜的文化体系，是南北远古文化交流的桥梁和东西互动的主体，对更大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重新审视这里曾经璀璨夺目的文化创新及波澜壮阔的文化互动，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中华文明从多元到一体的形成过程。

（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院教授）

## 文化遗产

本版邮箱：ysbj@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版式设计：沈亦伶

当枫叶如火焰般染红江岸山峦，长江流域便悄然换上了秋日盛装。这方水土，不仅有着“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的壮阔诗意，更在岁月的长河中沉淀下无数承载着秋天记忆的文物。它们宛如一颗颗璀璨的星辰，散落在长江流域的各个角落，静静诉说着秋的故事，等待着我们去聆听、品鉴。

秋日的田野，是丰收的象征。四川博物院藏东汉收获弋射画像砖，生动再现了蜀地秋收的繁忙景象。画像砖分上下两部分：上部为弋射图，荷池岸边，两人张弓仰射，天空鸿雁惊飞，生动刻画出秋猎的紧张与活力；下部为收获图，农人持镰割稻，动作协调，稻穗低垂，尽显丰收的喜悦。整幅画面无色彩渲染，通过线条的疏密与构图的呼应，让今人得以窥见2000年前长江流域的农耕生活。

秋猎，是古人重要的季节活动。湖北省博物馆藏青白玉镂空秋山饰，明代梁庄王墓出土，以6.6厘米的玉雕空间，构建出一幅生动的秋日狩猎图。此器纹饰极具金代特色，应为金代遗留器物，反映北方游牧民族秋日射鹿的习俗——文献记载，鹤捕鹤图案为“春水之饰”，虎鹿山林图案为“秋山之饰”。玉饰中部雕琢双鹿回首相望，鹿角以珍珠盘纹装饰，身旁枫叶火红，灵芝与柞树点缀其间，形成“鹿鸣秋山”的安宁意境。镂空雕技法，使厚度仅1.1厘米的玉料呈现出多层次景深，展现了金代玉雕的巅峰技艺。梁庄王墓出土的秋

图片从左往右依次为武汉博物馆藏清代粉彩折桂图鼻烟壶、南京博物院藏清代铜胎掐丝珐琅琮式瓶玉石菊花景、湖北省博物馆藏青白玉镂空秋山饰。

山玉与同时期楚地玉器风格迥异，却共存于一墓，见证明代多元文化交融。

秋高气爽，人人出行踏秋。武汉博物馆藏清代粉彩折桂图鼻烟壶，藏着楚地中秋的“市井浪漫”。这只小巧的鼻烟壶，壶身绘着几个扎着羊角辫的童子：他们举着桂枝、抱着月饼跑过桂树，花瓣落在肩头。“折桂”是楚地中秋的传统习俗。

古人认为，桂树是“月中仙树”，中秋折桂能“沾月神福气”；而“折桂登科”的寓意，更让家长们希望孩子能像童子那样，“蟾宫折桂”，科举及第。这只鼻烟壶的主人，把中秋的“折桂”画在日常用的鼻烟壶上，既满足了“赏桂”的雅趣，又悄悄种下“子嗣成才”的祈愿。

菊花是秋天的使者，象征高洁与坚韧。南京博物院藏清代铜胎掐丝珐琅琮式瓶玉石菊花景，融合了珐琅工艺与花卉艺术，既具皇家气派，又富文人意趣。

晚秋，也承载着离愁与哲思。上海博物馆藏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图册共八开，每开均描绘了秋季不同的山水景色，涵盖了江南水乡的秋景、层林尽染的山峦、秋江落日等多种场景。画家以细腻的笔触和丰富的墨色变化，展现了秋天大自然的绚丽多彩和宁静悠远。董其昌是明代著名书画家，《秋兴八景图》画面既有文人画的高雅气质，又不失自然山水的生动神韵，蕴含了画家对人生的感悟和对自然的热爱。

这些文物，见证了无数个秋天的轮回，让我们不禁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从历史时空中秋漫而来的秋色。

（作者单位：湖北省博物馆）

## 细篾织春秋

邢增尧

“竹海翻绿浪，剡溪织翠纹，巧手编日月，细篾织春秋……”这首流传于我家乡浙江嵊州的民谣，唱出了竹编技艺与这片土地的深厚情缘。

走进文创主题馆，那些静静陈列的竹编制品，总让我想起童年时邻家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俞樟根手指尖翻飞的篾片，空气中弥漫着的竹香。

常听老人说“竹是通人性的”。俞师傅说：“竹编就像做人，每一道工序都急不得，每一根竹丝都要守它的本性。”从选竹、破竹到编织、收边，竹编作品要经历数十道工序。我见过老师傅编一只竹鹰，光鹰翅就要用上千根细如发丝的竹丝，每一根都要粗细均匀、排布有序。正是这样的坚守，让嵊州竹编从日常用具走向艺术殿堂、从家乡走向世界——1979年，《白尾海雕》飞进白宫；1984年，《昭陵六骏》海外展出引起轰动，被誉为“东方的竹艺珍宝”；相关纪录片更让这项技艺声名远扬。

嵊州竹编的源流，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东晋时，诗人许询见当地竹编扇精美，曾留下“篾疑秋蝉翼，团取夏舒”的赞叹。宋元明清，竹编工艺又有长足的发展，始建于南宋、清代重修的嵊州城隍庙里，两把竹编宝扇，编织之精致、工艺之精湛令人拍案叫绝。新中国成立后，嵊州竹编技艺更是突飞猛进，开创了花筋、漂白、蓝胎漆、模拟动物等新工艺。2006年，这项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如今，古老竹编正焕发新颜。在共富工坊里，年轻人与老师傅并肩而坐，将传统技艺编入时尚灯饰、文创雅器。清华大学、中国美院的师生常来采风，为竹编注入现代美学。老手艺不再只是记忆中的风景，更成为乡村全面振兴的亮色。

（作者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说说我家乡的非遗  
说说我家乡的非遗

## 一方残帛，一部无字书

刘大玮 谷雨珊

可复原当时的纺纱技术、织造工艺；而染料成分的研究，则有助于追溯色彩来源及其文化传播路径。

2020年末，青海都兰热水墓群2018血渭一号墓的墓室淤土中，发现了一件扎染经色织物。我们团队随即开展现场应急与实验室保护工作，经过匣取、清洗、整形、加固等多道工序对其进行保护，使其得以留存。

碳14测年表明，这件纺织品距今已逾1200年，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的扎染经色织物。这一发现，将我国扎染技艺的确切历史提前至盛唐时期。检测发现，织物纤维主要成分为桑蚕丝，染料中有川黄檗等成分。结合植物考古研究可知，青海都兰地区的气候环境无法养蚕缫丝，亦不符合川黄檗的种植条件。

织物从何而来？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判断这是《通典》《大业杂记辑校》《元和郡县图志》等多部文献中均有详实记录的“斑布”，主要产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地区，并长期以“土贡”形式运往唐都城长安。而都兰地区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交通节点，为扎染经色作物流通提供了便捷的传播路径。

中国作为丝绸的发源地，古代通过

丝绸之路将优质纺织品与先进技术传播至亚欧大陆，留下了丰富的物质文化遗产。2025年初，我们团队曾前往乌兹别克斯坦蒙扎铁佩遗址开展出土纺织品保护修复项目，该遗址共出土纺织品21件/套，纤维类型主要为丝，织物类型涵盖绢、缣、锦等。尤其是其中的织锦，对研究丝绸之路物质文化交流以及纺织技术历史流变，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如今，借助三维建模、动态捕捉、虚拟仿真等数字手段，研究人员不仅能够复原出土服饰本身，还能还原其穿着状态，助力文物的展示、教育与研究。2022年底，我们团队便开始尝试这一工作，逐渐建立起一套成熟的古代服装实物数据采集模式。我们利用体质人类学、古DNA技术采集墓主人的体征数据，利用